



170

Li, Xing

Published i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Publication date:
2018

Document Version
Publisher's PDF, also known as Version of record

[Link to publication from Aalborg University](#)

Citation for published version (APA):
Li, X. (2018). : 170.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2018(1290).

General rights

Copyright and moral rights for the publications made accessible in the public portal are retained by the authors and/or other copyright owners and it is a condition of accessing publications that users recognise and abide by the legal requirements associated with these rights.

- Users may download and print one copy of any publication from the public portal for the purpose of private study or research.
- You may not further distribute the material or use it for any profit-making activity or commercial gain
- You may freely distribute the URL identifying the publication in the public portal -

Take down policy

If you believe that this document breaches copyright please contact us at vbn@aub.aau.dk providing details, and we will remove access to the work immediately and investigate your claim.

马克思依然在场

——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 周年

◎李彤

今年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撰写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 周年，这部文献不仅是世界上最富影响力的政治著作，同时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观最为简洁睿智的表述。伴随着时光的流逝，这本小册子似乎已经不如起初问世时那么吸引人，但是，这并不能遮蔽其所蕴含的真理。尤其是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这本小册子在欧洲乃至全球又时髦起来了。现在重读这个古董般的小册子，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部文献依旧可以穿越时空，在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时仍能使我们从中受益、得到启迪。《共产党宣言》在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于当代的发展也具有超越时空的远见卓识。同时，对于当今时代发生的全球性事件，重读它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分析思路和洞察性的阐释角度。

《共产党宣言》与当今的全球化

从任何角度而言，《共产党宣言》对今天资本的发展和全球性扩张预言的正确性甚至比在 1848 年它问世时更为显著。当今全球化已显示出，“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真正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普遍体系。其普遍性的核心在于当今世界每一个经济体几乎都要按照资本的逻辑——积累、商品化、最大限度利润、自由竞争和市场化来运作。我们目前正处于最贴切地回归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学说的历史性时刻”。《共产党宣言》精准地预测到了历史转向世界历史，并客观地揭示了世界历史到来之后的全球化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世界历史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以至于连精神的生产都变成世界性的，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

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阶段都紧密伴随着持续的创新和科技的应用；蒸

汽机使国家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电气化和内燃机推动了帝国资本主义的海外扩张；计算机互联网和原子能促成了目前我们所亲身经历的全球化。正是其新的商品和技术的生产与再生产，使得资本主义地理版图的扩张成为可能。早在 170 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立足工业时代，预言了世界经济全球化及其效应问题；“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各地消费。”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需要不断开拓市场，驱使资本走向全球各地，甚至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

从《共产党宣言》到回归马克思

今天，我们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 周年，实则就是要“回归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出的精准定位和基本判断上来。马克思将毕生精力倾注于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批判。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了现代世界社会主义的运动实践和尝试，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只是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是提供了实现社会主义的蓝图或规划。他并未对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以及将来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如何运作给出具体的行动方案和建议。在马克思之后的世界历史中，“社会主义”是作为一种社会变革的推动力，发展策略或者调节机制，而非一定是政治和经济体制而被诸多国家所采用，这其中包括西方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马克思之后的历史演进中，马克思当初构建的社会主义“蓝图”不仅深刻影响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而且影响

了西方工业社会整整一代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已经展示了其巨大影响力，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的建立，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链条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为发展策略，实现了社会的全面变革和发展，为世界上渴望实现民族独立、期望实现社会发展的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被认为是西方现代意识形态的一个挑战。

因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历史上并非只是过眼烟云，相反，当今世界的发展及趋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言的极相类似。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却误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其本质上不过是“经济决定论”，但是翻看《共产党宣言》，我们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 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1890 年，在对马克思唯物史观诸多的分析和讨论中，最大的分歧点也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批评。当时恩格斯在写给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对此作了全面的驳斥。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有人把这个曲解为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因素，那就把这个观点转变为一个毫无意义的、抽象和愚蠢的短语。恩格斯进一步强调，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上层建筑的影响因素也对历史斗争的过程产生影响，很多情况下在决定它们的形式时占有优势。在此基础上，恩格斯本人欢迎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他和马克思的理论作出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他们所未强调的东西“硬加”在他们身上。从这封信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

斯完全意识到了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应有作用。他们向世人传达着他们的重要观点，即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符合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而这一点一直被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所忽略。我想，这就是我们依然需要阅读《共产党宣言》的根本原因。

《共产党宣言》的超时代性

目前，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经济危机依旧影响着全球的经济，一旦我们放松警惕，新一轮的全球经济衰退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危机必将纷至沓来。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是要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世界历史、资本主义制度等的精辟分析。在这个意义上，只要资本主义社会不从制度上变革自身，那么马克思预示资本主义必将走向危机的预言依然有效。著名学者罗伯特·海布隆纳对马克思作出这样的评价：“马克思有很好的遗产，当然是结合他的一定天才，开创了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并给世界留下烙印。我们要回归马克思并不是因为他没有错误的，而是因为他是无法回避的。所有的人沿着马克思开创的科学研究的路径走，就会发现马克思总在他们的前面。他们必须要么同意或反对，要么扩展或抛弃，要么解释或排斥马克思的思想遗产。”

《共产党宣言》揭示了一个时代，即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无情剥削的时代，同时预示了一个新时代，即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实现共产主义的时代。值得期待的是，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共产党宣言》预示的时代而砥砺前行，并探索出一条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不论这条道路多么艰难和坎坷。

（作者单位：丹麦奥尔堡大学发展与国际关系中心）

交往行为理论的真实意蕴及其困境

◎宫瑜

自主性概念诞生以来，围绕主体性问题的探讨与争论便从未停息。随着主体理性演变为理性主体的终结，建立在传统理性基础上的主体形而上学迅速失去了往日的绝对权威，各种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的现代思潮相继涌现。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将主体性的研究视角由纯粹精神领域转向现实生活世界，才能真正解决主体性的本质问题。沿此思路，其创立了“语言理性范式”的交往行为理论，虽然此举旨在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遗产，却忽视了“生产和再生产范式”的基础性意义，而无法完整说明和展现人的社会行为与交往实践。

主体性的危机与重构

近代哲学将主体性置于自我反思的纯粹理性思维范式当中，作为一切真实性知识的最终来源乃至人之为人的安身立命之本。然而，在经历了休谟的经验主义式怀疑、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费希特和谢林的匡正与整合以及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巅峰之后，这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主体性已随着理性自身的逻辑推演而彻底丧失了主动性与其权威性，以致不得不承受现代哲学对主体理性的诸多不满与批判。究其根源，意识哲学主体性的危机，主要在于传统认识论对先验理性逻辑的绝对信任，并由此确定主体的存在和主体性的内蕴。但如此一来，主体便被限定为仅具有认知功能的先验主体，主体性也不过是一个囿于纯思辨的抽象概念，结果只能深陷“唯我论”的泥潭而脱离现实世界，无法得到证明和实现。

针对主体性在纯思维领域中的画地为牢，自说自话，现代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试图通过各种方式予以挽救和重构。在理性主义阵营中，胡塞尔指出主体性是一种交互主体间彼此确认的互识与共现，理性也是一种主体间性的世界，不过因其始终以直观明证性的“先验自我”为基点，所以并未摆脱意识哲学的演绎思路；伽达默尔认为主体间经由语言而达成的相互理解和视域融合才是理性的充分彰显，但他在本体论上将解释学的语言性绝对化的做法，导致了之后非批判的语言决定论倾向。非理性主义则为直接，其分别尝试以主体自我的内省直觉、体验良知、生存情态等来取代主体性的本质构成，但同尼采的意志主义、伯格森的生命哲学一样，它们均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独断论色彩。虽然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结构的三重规定，明确了主体的现实性、共在性、开放性等固有特征，可在理论上对存在与存在者、世界结构与现实之物的区分，却根除了命题性真理，削弱了话语性和论证性思想。其实，想要真正解决人作为主体的实质性问题的关键，在于由意识哲学的先验主体转向社会实践的实践活动，从自我与他人的现实关系中去考察和探讨主体的存在及主体性问题。

以语言为中介的主体间性

主体性的苦难历程促使哈贝马斯对其展开了深刻反思。结合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他认为主体绝非是仅具有认知构造功能的先验主体，而应是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实践主体，与之相应，主体性则是主体在社会化与个性化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产物。通过考察自我同一性的结构和群体同一性的结构，以及种群历史的进化与更新，哈贝马斯指出，社会的再生产和社会成员的社会化均取决于同一种结构，也就是说，不同主体之间借由语言所达成的相互理解解带来了种群历史的更新，同时这种更新又使社会文化的学习过程成为可能。个体发生领域和系统发生领域同步进行并带来两种结果，一是稳定自我的形成、发展、完善，二是自我对于社会规范的认同。可以说，主体在融入特定社会体系的同时，也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即一种持续增长的解决问题的理性能力，而且凭借这个能力，主体能够很好地与外在自然、内在自然及文化和社会的象征性结构

相协调、相融合。无论是以物质生产为目的的对象性活动，还是与社会、他人共处的交往活动，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实践主体都是在同一个理性体的不断学习和学习的过程中得以形成的。

因此，“当认识论的自我（作为整个自我）通过每个单独的自我和所有其他的自我共同具有的认识能力、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普遍结构表现其特征时，实践的自我（作为个体自我）就在完成自己的行为过程中形成，并且使自身得到巩固”。作为实践主体的自我是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和社会关联中凸现出来，从而确证自身、实现自身，成为与众不同的个体而存在。此时的自我再也不是意识哲学那个迫切期待他者承认却无法证明自身的认知主体的先验自我，而是一个具有主体间性内核的实践主体的独立自我。同样，每个单一主体均是在以语言为中介的主体间性的相互作用中，不断更新自身的理性能力，对他者的检视或修正作出合理的判断与选择，并在个性化的同时社会化，从而推进

主体间的交往实践进程。不可否认，哈贝马斯落脚于实践的主体间性思想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正是以人的存在方式（实践）去解决近代哲学的主客二元对立，将纯思维逻辑规定的“无人身的理性”转向从事实践活动并在实践活动中发展自身的现实的人。人首先是在生产劳动中确立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地位，并在作为人类历史之产物和结果的同时成为社会历史的主体。虽然二者皆从实践出发去考察人的主体性问题，但由于所采取的思维方式与观察视角不同，所以在论及主体间的交往实践时，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理论架构分别呈现出不同的意蕴和特点。

“生产和再生产范式”与“语言理性范式”

如果说马克思是基于“生产和再生产范式”，以物质生产实践（劳动）来揭示主体间的交往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形态，那么哈贝马斯则是基于“语言理性范式”，以语言为中介来构建交往行为理论并借此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前者注重的是在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主体间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凸显的是个人与个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间的物质交往、利益交往、阶级交往等交往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贸易、合作、战争等多种交往形式。后者注重的则是在语言对话中所形成的主体间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社会规范等方面的彼此联系，凸显的是个体与个体间的精神沟通、价值认同、视界融合等交往关系，以及符合语言有效性要求和交往合理性的话语交往形式。

可以说，在哈贝马斯那里，语言相较于劳动具有更为优先的、普遍的、无可回避的约束性力量，正是语言使人类的文化再生产、社会交往、社会整合与适应成为可能。所以，他致力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倒转了马克思关于生活世界的物质再生产决定生活世界的符号再生产的观点，认为主体间以语言为中介的社会交往和发展决定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和分工。

但实际上，这种完全基于语言本体论的主体间性不仅忽视了社会与外部自然的经济发展关系，而且忽视了非语言交往的可能。交往实践需要以语言为中介，但又不仅仅只以语言为中介。劳动内含双重关系：一是人与对象世界的自然关系，二是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人们的一切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均以此为前提条件。需要明确的是，只有立足于物质生产实践的坚实基础，主体间性与交往实践才能得到更为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与解释，从而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的理论建构，破解其所面临的困境，进而释放出巨大的创造性思维潜力。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5JJD720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郭艳君

大约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思想就开始被翻译和介绍到中国。但当时中国是苏联传统教科书体系一统天下的局面，加之特定的政治环境，西方马克思主义被视为“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仅是批判的对象。这一基本理解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80—90 年代。自 1978 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才真正得以展开。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得到发展，既是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自身变革的需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

从中国现实社会的发展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适应了中国改革开放需要。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这就需要对当时西方的社会思潮情况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徐崇温先生在《学术自传》中提到，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央领导同志让“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一份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材料。——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搞了一份六千字的材料”上报中央。可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单是学者个人兴趣所在，更是适应精神文明领域贯彻对外开放方针的需要。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改革开放后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思苏联传统教科书体系，并在理论上进行创新，以适应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正是这种反思，引发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探讨。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阐释，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研究，对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必须注意到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那个时代的中国学者既具有强烈的现

实关怀，又具有明确的反思和批判意识。因此，他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不是简单地接受，简单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等量齐观，而是将其作为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必须认真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并始终以反思和批判的态度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批判地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并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结合起来。

在对马克思思想文本进行重新解读的过程中，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之中一些没有给予充分注意的问题也呈现出来，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东方社会理论、人类学研究等。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已经逐步摆脱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束缚，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多种不同的解释路向，如人学、人本主义、发展哲学、社会哲学、实践哲学、实践本体论、交往哲学、生存哲学、文化哲学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基本格局。也正是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做出客观的解读。

因此，我们看到在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互动的格局。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方面，“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不仅是一个个口号，更成为实际的行动，并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主题的过程中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课程已经在各大哲学系展开，出版了一系列相关教材的同时，以我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为基础，学界开始重译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和新著。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构，现代西方社会的一系列问题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这就进一步强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解答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积极意义，也带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扩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英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等逐渐成为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门领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在利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分析中国问题的同时，始终坚守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文本解读为坐标的立场，在批判地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同时，也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当代中国阐释，从而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真正摆脱了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束缚，实现了根本性的变革。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

综观这一理论创新发展过程可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译介、研究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是同步展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科学解读马克思主义思想文本、反思与批判苏联教科书体系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对马克思文本的深度解读又使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能够理性地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成果，并通过直面中国现实问题，实现了创造性的转换，开创了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局面。深入分析这一过程中文本、思想与现实的关系，无论是对于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还是对于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包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第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既要立足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文本的精准理解和把握，更要直面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以理论去理解

和阐释当代中国的现实，并为现实问题的解答提出理论路径。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有机部分，必须保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研究的互动。目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过于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个人的思想研究，少有结合这些思想家面对的现实问题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定位来展开研究。其结果就是为了研究而研究，造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碎片化、新奇化。这种倾向不但无法真正理解和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更缺乏基本的价值判断，从而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丧失了其应有的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

第三，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研究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都必须直面当代中国的现实。但必须注意到，今天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 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是有差别的。尽管今天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面对的西方现实问题与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之间仍具有相似性，但差别已经体现出来了。一方面，日益深入的全球化已使部分现代西方社会问题全球化，成为全人类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另一方面，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及其取得的成就，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并使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呈现出独特的中国特色。在这种情境下，如果还是简单地套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来看待中国问题是行不通的。因此，必须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立足于中国发展带来的全球性转变，才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新的人类文明类型建构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